



「四個肯定」寄寓深意 五年規劃發展為要



陳克勤

議事論事

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結束兩日香港調研。日前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總結時表示，夏主任此行給予特區政府四個方面的肯定，包括肯定特區政府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決心和推進工作、肯定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努力，以高水平安全支持高質量發展、肯定香港的經濟發展、肯定特區政府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建設。對比這四個面向和中央對港政策的長期論述，可以看到中央對香港發展的高度關心支持，以及所寄予的殷切期望。

夏寶龍主任提出的「四個肯定」，圍繞的是國家安全、經濟發展、科技創新，以及香港制度建設的改革，這些都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，也是中央一直以來期望香港能強化治理的核心部分。以高水平安全作為支持的高質量發展，意味着香

港堅定實行行政主導體制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機關各司其職，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，讓治理效能得到顯著提升；經濟發展其實就是發展動能的不斷增強，與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、更緊密的交流合作，積極對接「十五五」規劃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「一帶一路」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，來釋放香港不同方面的發展潛力；科技創新也就是產業的多元化，代表香港結合自身優勢和資源稟賦，精準定位邁向轉型，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。

指出重點改革發展的方向

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，就是香港制度上的一次大改革，這是特區政府對「一國兩制」實踐進入新階段這一重要論斷的直接回應，也是對如何進一步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答卷。對於特區政府而言，「四個肯定」不止是單純的正面評價，其強調的是中央持續關注的政策重點，期望特區可在未來施政中長期堅持、

重點聚焦的目標與方向。

在這一政策框架下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編制與諮詢，便是將治理的戰略目標轉化為系統性治理工程的重要載體。目前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正進行公眾諮詢，而特區在制訂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工作進度如何、遇到問題如何等，也都是中央高度關注的事。從制度層面而言，這是本港規劃治理從以年度施政報告為主軸的短周期部署，轉向中長期的前瞻性規劃。從公布的諮詢文件可見，香港五年規劃不在於目標覆蓋面有多廣，而在於為發展目標確立清晰的優先秩序，將政策能量和公共資源集中於具備最大帶動效應的領域。

並且，從夏主任的考察路線亦可發現，其行程高度聚焦北都，涵蓋洪水橋、新田科技城、河套香港園區及新皇崗口岸等節點，這一帶既是創科產業的承載空間，亦是深港要素流通的戰略接口，同時具備疏解本港住房壓力的功能，屬於多重政策目標高度重疊的優先地區。圍繞基礎設施、

產業集聚與人才引進建立清晰的推進次序，則資源整合的效益將遠大於分散部署。

將中央支持轉化為發展動能

五年規劃與年度施政報告如何銜接，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治理問題。特首李家超提出將兩者結合的施政理念，其邏輯在於以五年規劃確立中長期的政策目標與優先次序，以施政報告作為年度執行的具體安排，兩者分屬不同層次，但應保持內在一致。這一安排有其制度上的合理性，在缺乏中長期規劃的情況下，年度施政容易受短期政治或經濟壓力左右，政策取向缺乏穩定的參照，前後任政府之間亦難以形成清晰的政策傳承。有了五年規劃作為頂層框架，每年施政報告的政策調整便有跡可循，哪些是因應外部環境變化的戰術調整，哪些是五年目標的階段性落實，公眾與立法機關均可據此評估施政成效。

當然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仍然顯著，

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結構性變化，均可能對香港的政策優先次序造成影響。在這一過程中，長期目標的方向應當穩定，但具體手段與治理措施應因時制宜。能否在戰略定力與戰術靈活之間取得恰當平衡，將是檢驗特區政府規劃與治理能力的核心指標。

「四個肯定」所體現的，是中央對香港施政成效的持續關注與階段性認可，也為特區政府未來工作提供了明確的政策座標。首份五年規劃的制定，正是期望將這些座標搭建為系統性的長期治理工程。規劃的成功與否，最終取決於其能否在宏觀戰略與微觀執行之間建立有效橋樑，尤其要在北部都會區等優先區域，圍繞基礎設施、產業集聚與人才引進形成清晰的推進次序。唯有如此，規劃才能真正服務於香港的發展需求，並將中央的支持轉化為市民可感的民生改善與社會進步，真正體現「以民為本」的治理初衷。

民建聯主席、立法會議員

雙榜再出彩 乘勢創新局



卓銘

新聞背後

近日有兩宗新聞讓香港社會倍感振奮。其一，國際管理發展學院（IMD）發布《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》，香港全球競爭力排名實現三連升，本年度位列全球第二，創下2019年以來歷史新高；其二，國際高等教育評鑒機構QS發布最新世界大學排名，香港持續維持五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強，多校位次大幅攀升，連續兩年獲評亞洲進步最顯著的高等教育體系。兩項來自國際權威組織的肯定，不僅印證香港在教育、經濟領域取得矚目成果，更深刻說明，香港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光明前路。

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

兩個世界排名榜的結果，為各界帶來三重啟示：

首先，香港收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，是中央為香港完善制度根基、特區政府堅守國家安全底線，以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結果。在QS最新排名中，香港大學連續兩年位列全球第11位；科大則大幅躍升11位至第33位；理大亦首次躋身全球前50；而在《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》中，香港排名僅次長期競爭對手新加坡，在「政府效率」、「商業效率」、「基礎建設」和「經濟表現」等關鍵領域均表現卓越。

不同領域的進步看似互不相干，但細想之下，唯有一個穩定開放而自由的環境，才能讓大學遠離不必要的政治紛爭，聚焦教學科研；也唯有一個安全高效成熟的營商環境，海內外企業才會對香港前景抱有信心，選擇投資以至落戶於此。實踐經驗已充分證明，「一國兩制」之下，維護國家安全與香港繁榮發展高度統一。沒有安全穩定的前提，高等教育如何吸引全球人才，香港又豈能得到國際社會對我們在法律及監管環境方面的信任？國際社會高度肯定的背後，反映的正是由亂到治帶來的發展紅利。

其次，香港教育、競爭力方面在短時間內的跨越式提升，離不開本屆特區政府主動有為、精準施策。近年來，特區政府積極出招，以各種形式「搶人才、搶企業」，並大力打造國際教育與創新樞紐，推動香港成國際人才集聚高地。

過去3年，香港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已吸引近60萬申請，近28萬名人才及其家屬落戶香港。其中，「高才通」計劃自截至2025年底，已收到逾15萬申請，超過10萬人落戶，每年為香港帶來約340億港元的經濟貢獻。與此同時，特區政府還大力推動第三間醫學院、中醫醫院等重要項目的落成，在傳統的專業服務優勢上擴容，引導大學科研向更高增值領域延伸，間接為國際人才交流提供了最合適的平台。

其結果便是，這些海外內頂尖人才帶來的國際視野與創新動力，直接提升大學國際化指標，也為香港的國際競爭力打下堅實基礎。更多海外學者和學生選擇來到香港的大學，促成研究合作與知識交流。同時，人才集聚也帶動企業落戶，強化產學研融合。特區政府針對生命健康科技、人工智能、fintech等戰略產業提供的一系列政策，吸引全球頂尖企業，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創新中心的地位。

利用科教優勢乘勢而上

最後，當前正迎來歷史性機遇的香港，必須乘勢而上，充分利用科教優勢，推動北部都會區等重大項目，對接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，加快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北都已獲納入「十五五」規劃，為打造「南金融、北創科」的全新格局，北都發展尤其需要香港的大學科研實力作為支撐，加速技術轉化和前沿突破。

如今河套區的創新平台已吸引多個大學和企業項目入駐，推動跨境科研合作，北都大學城更將直接對接高校資源，培養本土與國際人才。同時政府亦正加速基礎設施建設，推動新發展區等項目穩步落成，並就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。不論是日後繼續深化大灣區合作，抑或借助北都都會區拓展產業空間，實現香港「再工業化」，香港都必須借助科教優勢，深化人才和企業吸引策略，以對接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為抓手，在服務國家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發展。

香港擁有的巨大優勢得到國際認證，也就說明只要社會各界團結一致、乘勢而上，一個更具競爭力、更具活力的香港，在國際舞台上綻放更璀璨的光芒。

擁抱科技浪潮 堅守教育初心



鄧飛

議事廳

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明確強調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體化發展，提出以創新科技引領國家邁向現代化強國，並全面推進「人工智能+教育」行動。面對全球數字化轉型浪潮，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，特別是在北部都會區致力打造成「國際專上教育樞紐」的宏大願景下，從中小學基礎教育抓起，培養具備高數字素養的優質人才，已成為支撐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重要基石。

《藍圖》為數字教育提供清晰指引

在此關鍵時刻，教育局近日公布了《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》（下稱《藍圖》），提出「四大重點、十大策略」，覆蓋學校整體規劃、教師培訓、學生培育、優化基建、交流協作等層面，這無疑為香港基礎教育邁向數字化轉型的開步提供了清晰指引。另一方面，在社會各界熱烈擁抱教育科技的同時，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，深刻反思一個根本問題：在AI時代，教育的本質與教師的定位究竟為何？

據筆者最近針對全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教師的問卷調查顯示，前線教師對AI輔助教學展現出高度熱情，逾半已將AI引入日常教學，在設計工作紙、整理考點和生成補充練習等環節上，取得了顯著的「減負」成果。這種由淺入深、實用先行的起步模式值得肯定。然而，科技的介入不應削弱教師的角色，反而更凸顯了教師專業判斷的不可替代性。當AI接管了基礎作業與海量文書處理後，教師便能將寶貴的時間與心力，重新聚焦於學生的個別差異、全人發展與情感關懷上。青少年的成長不僅僅是知識的累積，更包含品德的塑造、價值觀的建立以及心理健康的維護，這是任何冰冷的算法與強大的語言大模型無法替代的。

儘管AI在基礎文書處理上表現出色，但在深層次的教學應用中，如「分析學生常見錯誤」、「製作個人化學習進度報告」等，AI的使用率依然偏低。不少資深教師指出，現時通用大模型的批改能力參差，甚至會出現「AI幻覺」，教師往往需耗費大量精力覆檢。這正正說明了教師專業判斷的不可或缺性。AI提供的只是數據與概率，而教育需要的是洞察與引導。

在推廣數字教育時，我們亦須防微杜漸。麻省理工學院一項實驗報告指出，長期依賴人工智能協助寫作的學生，獨立構思、文字組織與邏輯思考能力會出現明顯下滑。因此，教師必須嚴格把控AI的使用場景，確保AI工具不會直接「餵答案」，防止學生將大腦「思考外包」。這一切風險防範與教學尺度的拿捏，全賴教師的專業判斷。

傳統的大班教學猶如早年的大眾服務，標準化但難以兼顧個性；而未來的數字教育，則應在保持大規模運作的同時，為每位學生提供精準的專屬方案。AI的威力在於其強大的數據運算能力，能精準分析每位學生在不同學科、甚至單一知識點上的長處與短板，進行詳盡的學情分析，協助教師走向因材施教。

然而，要真正落實因材施教，我們不能讓前線教師處於「單打獨鬥」的窘境。特區政府與教育局應牽頭研發具備本地化、保私隱、貼課程的「香港專屬教育AI平台」，並針對通用大模型難以精準處理特定學科的缺點，就一些核心科目開發專屬的「學科AI助手」，解決目前AI僅能作表面文書處理的技術瓶頸。在教師培訓上，應為資訊科技統籌主任及科主任提供進階課程，藉此培養校內的「AI領航員」，推動學校由「個別教師自行探索」轉型為「全校系統性推動」。

培養兼具傳統智慧與數字素養棟樑

綜觀《藍圖》的方向和推行策略，在教師培訓上，提及「分層式、多元化的數字教育專業發展活動，強化學校帶領變革與教學創新的專業能力」；在基礎配套方面，在宏觀建設上要「構建數字教育學習資源大平台」，在微觀教學上要「積極探究如何透過人工智能協助學校處理行政工作，減負增能」；在加強教師專業方面，目標之一是「推動教學範式轉向『以學生為中心』的個性化學習」，這些推行策略均回應了當前的發展需要。

面對勢不可擋的科技浪潮，香港教育界既要積極擁抱變革，更要堅守教育初心，以AI的精準算力，結合教師的專業能力，跨越傳統教學的局限，實現「因材施教」的理想。筆者期望在《藍圖》的引領下，香港的數字教育能穩步邁向高質量發展，為國家與香港培育出兼具傳統智慧與數字素養的未來棟樑。

立法會議員、教聯會副會長

G7 峰會戳破西方領導力失能的西洋鏡



宇文

看大勢

6月17日，為期三天的七國集團（G7）峰會在法國埃維昂萊班黯然落幕。會場之內，各成員國各懷心思；會場之外，民眾走上街頭，縱火焚燒汽車，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。這場被稱為史上「最小公約數」的G7峰會，以混亂的方式戳破了西方「領導者」失能的西洋鏡。

為了三天峰會，法國部署了約1.6萬名警察、憲兵等安防人員，瑞士在邊境部署4000名軍警，關閉25個公路口岸。但是嚴密的安保面對洶湧抗議，示威者高舉反帝國主義、聲援巴勒斯坦的標語，抗議者直言G7是「富人的聚會」。更諷刺的是，峰會尚未開幕，瑞士與法國已因安保費用分擔問題發生齟齬。一個自詡領導全球的集團，連自家門口的安保賬單都要推諉扯皮，其所謂的「團結」與「領導力」簡直就是笑話。

會場內的分裂和爭吵成為G7峰會無法掩蓋的病灶。峰會開幕，G7連續第二年未能發表領導人聯合公報。據日本共同社報道，這次峰會籌備期間即已放棄推動公報，轉而採取分議題發布文件成果的方式，「以避免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系列分歧」。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會後承認，美國與其他六國在氣候問題、聯合國多邊體系等方面立場迥異。一名英國官員甚至調侃，代表團只求飛機上的Wi-Fi能正常工作。G7峰會的成功標準低到如此不堪，已是對這個機制最徹底的嘲諷。

淪為口水戰的「富國俱樂部」

G7議題的空洞與失焦，進一步暴露了G7的失能失序。本屆峰會的擬定議題包括俄烏衝突、中東局勢、經濟平衡增長以及人工智能，但這些議題沒有一個能夠達成共識。《紐約時報》在峰會開幕前寫道：「七國集團會議曾經體現維護全球外交秩

序的努力，今年的集會則象徵着它的碎片化。」2003年同樣在埃維昂萊班舉行的G8峰會尚能「維持志同道合國家團結一致應對世界危險的表象」，而2026年，「這層表象已被剝去」。從「維護秩序」到「象徵碎片化」，23年間，這個「富國俱樂部」已經變成口水戰的秀場。

G7的窘迫不止於內部分裂，更在於其失去全球代表性。沒有新興經濟體的參與，它什麼都解決不了。本屆峰會邀請了巴西、韓國、印度、肯尼亞、埃及、烏克蘭等10餘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。法國總統馬克龍試圖通過拉攏「全球南方」國家來擴大G7的代表性。但這些國家也只是東道主刻意營造的峰會點綴，畢竟這些國家只是列席的看客而已。

中國作為局外人，G7峰會卻繼續操弄涉華議題。從全球經濟平衡、關鍵礦產供應鏈、人工智能治理，都指向中國。G7峰會最終聲明雖未直接點名中國，卻在東海、

南海及台灣海峽問題上「意有所指」地表達關切。這種「討論中國但不包括中國」的峰會模式，恰好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，不可能在一個排他性的「小圈子」裏完成。

拒絕中國參與的「全球領導者」

諷刺的是，G7國家的GDP佔全球比重已從巔峰時期的67%降至約40%，而G7國家對全球貢獻率的總和還不及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。這樣的G7批評中國，還以「全球領導者」自居，不僅是德不配位更是不自量力。美聯社則一針見血指出，「一個沒有中國參與的G7，還有什麼意義？」

更令G7難堪的是，峰會開幕當天，中國發布了《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》白皮書，同時宣布籌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，獲得近1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。一邊是西方傳統俱樂部連

統一表述都難以達成，另一邊卻是全球範圍內迅速擴散的制度性共識。明眼人看得出，相比中國對世界實實在在的貢獻，G7國家已經深陷經濟乏力與社會撕裂的泥淖之中，峰會上的爭吵與算計，以及拿中國作靶子，都難以挽回其在國際事務中日益邊緣化的命運。

如果說2003年在法國埃維昂萊班舉行的G8峰會還能「維持志同道合國家團結一致應對世界危險的表象」，到如今連續兩年G7峰會無聯合公報，G7這個「富國俱樂部」的蛻變軌跡清晰可辨。20多年來，G7的會址在變、議題在變、邀請名單在變，唯一不變的是它的日漸式微與不合時宜。當會場外的抗議聲蓋過會場內的演講聲，當這個「富國俱樂部」不得不靠邀請新興國家來撐場面，所謂西方「領導者」的西洋鏡，已經被現實戳得千瘡百孔。

G7該從「領導者幻覺」中醒醒了。國際關係學者